

鲁金波 著

隐逸避世的

名士集团

竹林七贤述评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隐逸避世的名士集团

——竹林七贤述评

鲁金波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逸避世的名士集团：竹林七贤述评/鲁金波编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ISBN 7-81039-968-3

I . 隐 … II . 鲁 … III . 竹林七贤 - 人物研究 IV
.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776 号

YINYI BISHI DE MINGSHI JITUAN

隐逸避世的名士集团

——竹林七贤述评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124 千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7-81039-968-3/I · 20

定价 9.00 元

竹林七贤图

(根据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七贤图重新剪贴)



嵇康

阮籍



王戎

向秀

刘伶

山涛

序　　言

“竹林七贤”是出现在三国末年曹魏与西晋交接时代的文士集团。其核心人物是阮籍和嵇康，此外还有志趣不尽相同的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共七位名士。他们都信仰老庄思想，崇尚玄学，蔑视礼教，不肯和黑暗的当局合作，经常在山阳竹林中聚会，饮酒抚琴，高谈阔论，对后世的文士生活和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故被称为“竹林七贤”。

提起“竹林七贤”，有人会立即想到他们怪诞放荡的行为和自在逍遥的玩乐，觉得十分有趣，这是一种很肤浅的认识。其实，他们是特定的时代造就的一批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七贤”都具有过人的才华，丰富的学问，深刻的思想，也曾有过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但生不逢时，赶上曹魏皇权旁落，司马懿父子擅权实行血腥统治的时代。他们目睹了许多残酷的事实，在政治高压下深感身家性命不安全，于是采取不与当权者合作的态度，隐入竹林，做出一些荒唐怪诞的行为，放出种种警世骇俗的言论，借以舒泄愤懑，向社会发出消极的抗议。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和利诱下，竹林名士集团终于解体。有的被野蛮杀害（如嵇康），有的当了高官显贵（如山涛），有的虚挂官名实际退隐（如阮籍），结局很不一样。那样黑暗的时代，扭曲了这样一些优秀人物的灵魂和生活，颇值得后人去理解。

和深思。

“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阮籍工于诗，嵇康长于文。阮籍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八十二首《咏怀》诗，堪称魏晋易代时期的史诗。他的《大人先生传》也是散文中的名篇。嵇康的诗今存五十余首，以四言为主。他的哲理散文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后世学者和读者推崇备至。此外，向秀的《思旧赋》和刘伶的《酒德颂》也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这些诗文集中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和志趣，细心研读是认识和理解他们的关键。因此，在评述过程中适当增加了诗文的引用量。

这本小书是在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刘景录教授的指导下写作的，刘教授还对初稿进行了认真修改。在此，深表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还可能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鲁金波
1988年元春

目 录

一、“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	(1)
二、“竹林七贤”名士集团的形成与解体	(11)
三、佯狂避世的阮籍	(19)
(一) 阮籍的生平	(19)
(二) 魏晋易代时期的史诗《咏怀》八十二首	(32)
(三) 阮籍的社会思想与旨意深微的玄学散文	(59)
四、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	(77)
(一) 童年生活与山阳隐居	(77)
(二) 与山巨源绝交和被司马昭杀害	(88)
(三) 托谕清远 峻切感人的诗篇	(100)
(四) 针砭时弊 蕴藉含蓄的名理文章	(119)
五、向秀和他的《思旧赋》	(146)
六、嗜酒任气的刘伶和《酒德颂》	(152)
七、侧身仕途的山涛、王戎和阮咸	(160)
八、“竹林七贤”的影响	(170)

一、“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

任何组织的产生都是和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竹林七贤出现在魏晋易代之际，当时政治上争夺皇权的斗争日趋激烈残酷，思想上魏晋玄学之风盛行。这是竹林七贤所处时代的两个突出特点。

曹魏政权在魏文帝曹丕即位后，为了取得世族豪门的支持，对他们的政治特权予以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在官吏选拔上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由各州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官，将当地的士人按才能分成“九品”，供政府按品级选用。由于中正官多为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官吏的原则也以“家世”为重，因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与此同时，魏文帝又下诏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并对曹氏宗室严加控制，不断地消除他们的封地和爵位，以致出现了“王侯皆思布衣而不能得”的局面。皇室势力在世家大族参政的情况下孤立起来，世家大族出身的司马懿借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待到魏明帝曹睿即位，皇权统治开始发生危机。他不恤民意，拒绝纳谏，大兴土木，营建洛阳宫室；又多次掠夺民间美女以充后宫。结果府库空竭，赋税加重；人民困於劳役，前方将士得不到及时的补养；连年征战，马不舍鞍，“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不绝。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病故，临终将八岁的幼主曹芳托孤给曹爽和司

马懿。由此而给司马氏篡政以可乘之机，祸乱也从此叠生。

本来魏明帝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室是有疑心的。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记载：景初二年冬，明帝病重卧床后，曾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嘱以后事；以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协助燕王共同辅政。可是，由于中书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亲于司马懿，嫉妒夏侯献和曹肇，恐其辅政后对己不利，遂以“先帝有诏，藩王不得辅政”为借口，向魏明帝谗毁燕王曹宇等人。明帝闻之怒曰：“谁可任者？”刘放、孙资见曹爽在侧，遂推荐曹爽，又举太尉司马懿参与。明帝问曹爽：“能否胜任？”曹爽汗流浃背，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刘放暗中踢他的脚，附以耳语，曹爽这才说：“臣愿死奉社稷”。明帝病危之际勉为采纳。刘放、孙资恐有反悔，就请明帝亲笔写下诏书。明帝说：“我困笃不能。”刘放即上御床，握着魏明帝的手强作遗诏。此后他便出宫高声宣读：“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在宫廷停留。”燕王曹宇闻之大惊，夏侯献、曹肇、秦朗也相与流泪退出。此时司马懿尚在汲县^①，接到诏书后料知宫中有变，遂星夜赶回洛阳，拜见魏明帝，与曹爽一起接受了托孤之命。

曹爽是已故大将军曹真的儿子，曹操的族孙，依靠祖荫庇护的浮华公子。他本无文才武略，辅政后即欲独揽大权。为了对付司马懿，他采用丁谧的建议，让幼主曹芳拜司马懿为太傅，以削夺他的太尉军权。曹爽又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提拔何晏、邓扬、丁谧、李胜等心腹到中央政权机构任职，并让其弟曹羲统率禁军，以表兄弟夏侯玄为征西将

① 汲县：今河南汲县。

军。他纵情任性，骄奢无度；饮食服饰，拟从天子；稀世玩物，充满家宅；甚至连魏明帝的遗妾、舞女也强行霸占，带回家中奸淫；并筑地下之室，雕刻四壁，与同党何晏等人纵酒寻欢。其弟曹羲都深以为忧，屡次泣谏。曹爽始终不理会，又经常与兄弟亲信出游，日暮不归。大司农桓范曾规劝说：“大将军总揽万机，手握重兵，不宜与兄弟并出。万一发生事变，有人关闭城门，岂能再进来。”曹爽竟然冷笑说：“谁敢如此^①？”他对托病不朝，不露声色的司马懿毫无戒备之心。孰不知司马懿正在暗中备战，伺机发难，控制曹魏政权。

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官僚地主家庭，是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他的高祖父是征西将军，曾祖父和祖父都官至太守，父亲曾出任京兆尹。东汉末年司马懿被曹操召辟。魏文帝曹丕即皇位后，他开始身居要职，是曹魏当时少有的谋略家。魏明帝时，司马懿统率大军西御蜀汉诸葛亮，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威信。景初二年，又统率四万人马东征，歼灭了割据辽东几十年的公孙氏，不仅掌握了曹魏的大部分兵权，而且成了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他和曹爽辅政之初，尽管曹爽在前台显赫一时，但远远不是他的对手。正始八年（247），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郭太后于永宁宫，擅专朝政后，司马懿也假装生病，闭门不出。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记载：河南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时^②，曹爽让他向司马懿辞行以探虚实。司马懿得知李胜来访即令两位婢女擦

①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

② 河南尹：即洛阳市行政长官。

扶着相见，步履蹒跚，病容满面。李胜连呼数声，他方回问，“你是何人？”李胜回答说：“我是河南尹李胜，奉命调任荊州史，特来拜辞，不意太傅病得这样重。”司马懿假为喘息着说：“我年老病重，死在旦夕，并州地处胡地，君当好好戒备。”李胜不知其诈，忙解释说：“我被派往老家荊州任职，不是并州。”司马懿又故意说：“你从并州来吗？”李胜又重复说调任荊州刺史。司马懿这才似有所悟地说：“我年老耳聋，没有听懂你的话。你回本州任职，一定会立大功，今与君别，恐不复相见。我有师、昭二子，才识短浅，还望君等念我旧情，多为照顾。”说罢遂流涕哽咽，又顾示婢女，以手指口，似作渴状。婢女忙取汤来，司马懿也不去接，直伸着嘴去喝，结果汤流满怀。李胜竟没有看出一丝破绽。他告辞后即向曹爽报告说，“司马懿苟延残喘，已魂不附体了。”曹爽也信以为真，大喜。然而，正是在这一假象的掩盖下，正始十年春，司马懿乘曹爽等人随魏帝曹芳到高平陵祭扫明帝陵墓、洛阳城中空虚之机，迅速集结私己势力，突然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亲自率领兵丁占领武库，出屯洛水浮桥，阻遏了曹爽回城的通路。大司农桓范对曹爽的劝谏应验了。司马懿面奏太后，弹劾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有无君之心”。因此，理应废斥，以俟就第，不得逗留宫廷，否则便以军法从事。郭太后本来为迁宫一事怨恨曹爽，所以当即允奏。待奏章送到曹爽手中，他犹如巨雷轰顶，吓得目瞪口呆。结果曹爽兄弟及何晏等人被司马懿一网打尽。不久，司马懿就大开杀戒，诛其八族，一次就杀了

数千人，暴露了他穷凶极恶的真面目。司马氏虽然操纵和控制了曹魏政权，但双方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此后十余年间，司马氏政治集团为彻底打垮曹魏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以武力屠杀为主要手段的强权统治。

在诛杀曹爽等人后，司马懿为控制曹党势力，曾提拔王凌为太尉。然而，王凌痛恨司马懿的阴险狡诈。他听说楚王曹彪有智勇，就与出任兗州刺史的外甥令狐愚相商，迎立楚王曹彪继任魏帝，都许昌，并暗中派人联络。结果谋泄，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及楚王曹彪均被司马懿逼杀，受牵连者皆被灭族。司马懿又将曹氏王公集居邺城^①，派人监视。

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擅朝专政。曹魏大臣仍谋划着反对司马氏的斗争。嘉平六年，中书令李丰和皇后的父亲张缉密谋相商，打算利用魏帝曹芳册封贵人的机会，召杀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不料走漏风声，司马师召见李丰，进行盘问。李丰怒斥说：“卿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擒灭耳^②。”司马师闻听勃然大怒，以刀柄猛击李丰，李丰当即毙命。司马师遂又逮捕夏侯玄、张缉入狱，派钟毓审讯。夏侯玄是当时的名士、玄学大师，以才学渊博，光明磊落著称于世。他不忍受辱，凛然相对：“我有何罪？你秉承司马师的意旨审问我，供辞随你自作。”于是钟毓代替夏侯玄草拟供辞，呈报司马师。夏侯玄和张缉均被斩于洛阳东市，夷灭三族。司马师仍不罢休，又带剑入宫

① 邺城：在今河南安阳境内。

② 《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

见曹芳，请杀张缉的女儿张皇后，曹芳亦不敢违抗。不久，司马师又挟持文武百官弹劾曹芳荒淫无道，迷恋歌妓舞女，听信谗言，闭塞贤路，不得为皇权继承人。请太后收回皇帝印玺。结果曹芳被废，另立了曹丕之孙曹髦。这是曹魏势力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事隔不久，镇守扬州的将领毋丘俭和文钦又在寿春起兵，宣称奉郭太后的密诏声讨司马师；并向皇帝曹髦表奏司马师十一条罪状：谴责司马师为臣奸慝不忠，坐拥强兵，专擅朝政，矫废君主，妄加酷暴，乱杀无辜，又“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强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之，一旦举事废主^①。”司马师在其党羽的力谏下，不顾新割目瘤的创痛，亲自东征。结果毋丘俭兵败被杀，同党七百余人被捕下狱，文钦逃往东吴。司马师也因目疾恶化死在军中。司马氏党羽傅嘏和钟会合谋，以司马师的名义急召司马昭前往许昌受领军务，于是军权转交给了司马昭。到甘露三年（257）五月，镇东将军诸葛诞再次率领淮南淮北的屯田官兵反抗司马氏，并派人联络东吴出兵支援。司马昭为平定这次叛乱，动员了二十六万人马，历时近一年，直到第二年三月方攻克诸葛诞的守城寿春，诛杀了诸葛诞等人。至此，曹魏势力可以说被诛杀殆尽，司马氏篡位代祚已成定局。

甘露五年（260），已经长大成人的曹髦目睹威权日去，不胜其愤。他不甘“坐受废辱”，遂亲自率领宫中僮仆宿卫

① 《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注引。

数百人攻打司马昭。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曹髦也被司马昭手下的亲信贾充、成济杀死。此后，虽然又立了魏元帝曹奂，但司马昭已经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在名义上取代曹氏也只是时机问题了，所以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自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到甘露五年曹髦被杀，短短的十余年间，司马氏大肆诛戮异己，不仅彻底打垮了曹魏势力，而且形成了“朝寡纯德之臣，乡乏不贰之老”的局面^①。司马氏如此凶残酷烈的暴行，就连他的后世子孙得知后都为之不安。《世说新语·尤悔》说：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晋明帝司马绍向温峤询问关于晋朝得天下的往事。王导说温峤岁数小不大知道，他便把宣王司马懿和文王司马昭诛杀异己，培植私己势力的事都说出来。司马绍听了觉得太残酷，就蒙上脸伏在床上说：“如果真像您说得那样，晋朝的国运怎么能长久得了！”在司马氏集团猖狂肆虐的情况下，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仕途名利之心。无不恐惧自畏，耽心祸难降临。为了逃避政局动乱带来的风险，他们纷纷避世隐居，寄情於老、庄。竹林七贤名士集团正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产物。

由於政局的动荡不安，在思想上魏晋玄学盛行起来，为

① 干宝：《晋纪·总论》。

竹林名士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玄学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衍变，主要是用老庄思想阐释儒家经义，诋毁当时的所谓名教礼法。玄学源於东汉末年的清议，不过东汉末年清议的主要内容是品评人物和时政，魏晋玄学则侧重於哲学思想的阐发。

东汉是名教统治的时代。名教是以正名份为主的封建礼教，提倡儒家的道德规范。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礼乐教化以及官吏的品评选拔等等，都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这对稳定封建秩序和遏制邪恶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统治集团的腐朽，豪强世族的崛起与竞争。特别是国家机构和官吏的选拔由窃取实权的宦官、外戚、大族朋党把持之后，名教则变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和诬陷他人的武器。社会上欺世盗名的行为越演越烈，朝政日趋腐败，终于爆发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了。名教之治不那么灵验了，不能再维系人心。一些有识之士也从社会现实中逐步认清了名教的弊端，于是开始寻求新的治世理论。

汉魏之际，曹操在削平北方群雄割据势力后，为推进统一事业的进程，建立专制统治，采纳了重法轻儒，贵实贱名的主张，由此发展为曹魏的名法之治，用人唯才。于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从探求人的才能与本性的相互关系入手，提出了当时玄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才性论”。《老子》、《庄子》和阐释人生与自然哲理的《周易》成了当时名士的主要谈资，被称为“三玄”，魏晋玄学由此得名。与此同时，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和世族势力的崛起，名教思想也重新抬头。名教要恢复昔日的权威，必须注入新的内容，做出新的合理的论

证。正始年间的学者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提出儒道结合的理论。何晏著有《论语集解》、《道德论》、《无名论》等，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等玄学著作。他们的根本思想是“贵无”，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何晏在《无名论》中说：“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王弼在《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中说：“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笃；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何晏和王弼是曹爽当权时的两位著名人物。他们鼓吹“无为”，显然是为曹爽制造舆论。曹爽是个不学无术的浮华公子。他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因而要求他人无为。他们还提出以自己为本，名教为末，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主张把道家的自然和儒家的名教结合起来。如王弼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於有，恒训其所不足^①。”巧妙地调和了重名教的儒家和重自然的道家的思想。他们认为尊卑名份都是源於自然的，所以圣人制定名教也以自然为依据。何晏的《无名论》中说：“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也就是说，圣人都任其自然，君主也应当无为而治。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门阀贵族垄断政权的要求。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要求国君无为。这样一来，既为世族特权及其对农民的剥削找到了理论根据，又为其奢侈腐朽的生活进行了辩护，同时还为那些空虚不安的士大夫找到了精神寄托，於是玄学清谈之风广为流行。

提倡名教的司马氏对何晏、王弼等人盛谈玄学，不遵礼法，造成名教陵迟的状况大为不满，因而从维护封建礼教出

① 《世说新语·文学》。

发，打着重振名教的旗号，扼杀新思潮，残害异己势力。继正始十年何晏被杀后，玄学大家夏侯玄也被诛杀。司马氏兄弟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废掉齐王曹芳，杀死魏帝曹髦。本来是他们自己既不忠也不孝，背礼妄行，却又偏偏胁迫郭太后下诏，给幼主一个“不孝”的罪名。封建礼教成了他们篡权擅政，诛除异己的武器。许多正直忠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纷纷惨死在司马氏妄加的“不忠”、“不孝”的罪名之下，造成朝野上下“名士少有全者”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嵇康和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更多地接受了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玄学理论。道家一向具有批判和否定儒家仁义、礼教的传统，崇尚自然和尊重人的个性自由。这都为竹林名士不拘礼法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了他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武器。于是他们相约为友，谈玄论道，寄情老庄，纵情诗酒，率性而为；以此拒绝同司马氏合作，进而攻击司马氏所宣扬的虚伪的名教及其残酷的强权统治，甚至非薄“六经”和圣人，嘲骂奉行礼法的世俗君子是裤裆里的虱子。由於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招致了司马氏对他们的迫害。